

# 《离骚》称“经”时间新论

李大明

屈原及其以《离骚》为代表的伟大作品,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,《离骚》甚至被尊称为“经”。但是,《离骚》称“经”始于何时,古今楚辞学者的意见是很分歧的。我在研习楚辞学史的过程中,对这一问题有了不同于历代学者观点的新的认识。我认为,对《离骚》称“经”时间的讨论,不只是为了澄清学术界长期争论乃至失误的一个老问题,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开展屈原及楚辞的研究。故撰为本文,请专家同行指教。

将《离骚》尊称为“经”,最常见的明确记载是东汉中后期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该书卷1录《离骚》,即题为“离骚经”,王逸的《序》还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训释,云:“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,忧心烦乱,不知所诉,乃作《离骚经》。离,别也;骚,愁也;经,径也。言已放逐离别,中心愁思,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。”由此,引发了古今学者对《离骚》称“经”时间的许多意见。寻其大端,共有六种说法。今一一进行检讨,以辨其是非得失。

其一,屈原自题《离骚》为“经”:上引王逸《序》所言,已使人觉得《离骚经》的“经”字是屈原自题。清人余萧客《文选纪闻》又云:“‘经’但训‘常’”,“灵均被谗见放,忧国爱君,太息流涕,形于歌咏,乃孤臣孽子之常。当时或自名‘经’,训义亦非无取。”王闿运《楚辞释》则发挥王逸的说法云:“依《章句》所言,则《离骚经》犹《逍遥游》,以三字为名。史公不容翦去‘经’字而作《离骚》也。屈子此作托于《诗》之一义,故自题为‘经’,言此《离骚》乃经义百代所不变也。”观二人所言,推崇屈原及其《离骚》,用心甚好;但是他们说屈原“自名”、“自题”《离骚》为“经”,一个是推测之辞,一个是“依《章句》所言”,都缺乏直接的证据。王闿运甚至以《逍遥游》三字为名解《离骚经》命题形式,更是无根之谈。

其二,宋玉题《离骚》为“经”:今人蒋天枢先生《楚辞校释》云:“‘经’字系原有”,“《离骚》下有‘经’字,殆旧题所本有,疑宋玉所题而汉人因之。”蒋先生这一论点的依据是:《楚辞章句》各篇《序》“疑六国末楚人传屈赋者已有所论,汉初后复有增益”,“其文自《楚辞》编定时已有之,不尽出王逸”。但是,“宋玉所题”云云,仍然只是推测之辞。况且,蒋先生既然肯定了《序》文在汉时代有增益,又焉知“经”字不是后人所增?

其三,汉武帝前后人题《离骚》为“经”(时间在刘安以前):明人钱澄之《屈诂》云:“‘经’字自是后人尊称。据王逸称,汉武帝使淮南王安作《离骚经章句》,则‘经’之称其由来也旧矣。”此言是说

因已有《离骚经》之名才有刘安的“章句”。今人陈子展先生《楚辞直解》亦云：“《离骚》又称《离骚经》，最初见于王逸的《楚辞章句·离骚经叙》”，“《离骚经》的经字未必是作者自题，后人加题可能是在汉武帝前后”，“看来这个经字还不见得就是王逸所杜撰，当是在淮南王刘安作《离骚传》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了。”陈先生此论从考察刘安《离骚传》的“传”字入手，持论比前述诸说严谨。但是他说《离骚》称“经”早在汉武帝前后，仍系推测之辞；又说《离骚》称“经”始见王逸《楚辞章句》，也是不对的（参后）。

其四，刘安题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：今人王泗原先生《楚辞校释》云：“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称‘离骚经’，‘经’对‘传’而言”，“淮南王安承武帝诏作《离骚传》，看来这‘经’字就是他作‘传’时加的。”此说亦从“经”“传”关系考虑，使人很受启发。但是，说刘安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，仍缺乏根据。况且，检《淮南子》一书，其引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皆不称“经”，所以他不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，本在事理之中。

其五，王逸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：清人梁章钜《文选旁证》云：“当时本无‘经’名，《离骚经》之名，实始于王叔师注‘经者，径也，言已放逐离别，中心愁思，犹依道径以讽谏君’云云，则竟似屈子自题‘经’字矣。”姜亮夫先生《屈原赋校注》亦云：“称‘经’直始于王逸无疑”，“盖王逸欲以《离骚》当‘经’，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以下当‘传’”，“此汉世经生结习，欲以尊其所好，妄为增益。”但是翻检汉世典籍，本有早于王逸的王充《论衡》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（见后引），所以二人的论断也有所失。

其六，后人题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：宋人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驳王逸云：“古人引《离骚》未有言‘经’者，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，尊之为‘经’耳，非屈原意也。逸说非是。”明人萧云从《离骚图经·自序》则云：“楚三闾大夫作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，而其徒宋、景以企淮南、长沙、朔、忌、向、褒辈皆拟之，遂尊为‘经’。”清人蒋驥《山带阁注楚辞·楚辞余论》云：“《离骚》以‘经’名，特后人推尊之词。王叔师《小序》以为‘经，径也，言依道径以谏君也’。若系作赋本名，可笑甚矣。他若《九歌》以下皆缀‘传’字，亦属赘设。”今人游国恩先生《离骚纂义》复云：“旧本此篇皆称‘经’，此乃后人所加，以尊屈子者。而王逸竟误为屈子自题者然，洪兴祖驳之诚当。后人纷纷曲说，甚无谓也。”上述诸家之议，浑言后人题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，这一点较前引诸说审慎。但是由于没有注意到王充《论衡》中已出现了“《离骚》之经”的提法，所以他们的观点仍然显得笼统而不实在，历代聚讼的问题仍未得到澄清。

综上所述，关于《离骚》称“经”时间的六种观点，皆有所失。那么，比较正确的结论又在哪里呢？这只能从有关典籍中寻求。

## 二

从我目前翻阅到的资料看，《离骚》称“经”的时间，最早是在东汉前期，而不是这之前，当然也不是晚至东汉中期以后。

整个西汉，学者们提到《离骚》，皆未称之为“经”。刘安《离骚传》（窜入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之中，说参汤炳正先生《屈赋新探·〈屈原列传〉理惑》）三次提到《离骚》，云：“《离骚》者，犹离忧也”；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”；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”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，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云：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同篇“太史公曰”云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

郢》,悲其志。”《太史公自序》又云:“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。”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录其《报任少卿书》作“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”,《文选·报任少卿书》同)同篇又云:“作辞以讽谏,连类以争义,《离骚》有之。”逮及西汉后期的刘向,其《新序·节士》云:“屈原遂放于外,乃作《离骚》。”《九叹》亦三处提到《离骚》,皆不以“经”称之:《惜贤》云:“览屈氏之《离骚》兮,心哀哀而怫郁。”《忧苦》云:“叹《离骚》以扬意兮,犹未殚于《九章》。”《思古》云:“兴《离骚》之微文兮,冀灵修之一悟。”西汉末世的扬雄亦不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。《自序》(见《汉书·扬雄传》)云:“怪屈原文过相如,至不容,作《离骚》,自投江而死。……乃作书,往往摭《离骚》文而反之,自岷山投诸江流,以吊屈原,名曰《反离骚》;又旁《离骚》作重一篇,名曰《广骚》。”

从两汉之际到明帝刘庄永平年间,《离骚》似仍未称“经”。班彪作于两汉之际的《悼离骚》(《艺文类聚》卷56),从标题看仍然未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;永平年间梁竦又作《悼骚赋》(《后汉书》本传李贤注引《东观纪》),从标题看仍未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。至于班固,在《汉书》和《离骚赞序》、《离骚序》中多次提及《离骚》,亦不以“经”称之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:“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,作《离骚》诸赋以自伤悼。”《贾谊传》又云:“屈原,楚贤臣也,被谗放逐,作《离骚赋》。”《冯奉世传》“赞曰”:“屈原赴湘,……《离骚》之辞兴。”《离骚赞序》(见《楚辞补注》)又云:“《离骚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。……屈原以忠信见疑,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离,犹遭也;骚,忧也。明己遭忧作辞也。……屈原痛君不明,信用群小,国将危亡,忠诚之情,怀不能已,故作《离骚》。”其言“忠信见疑”,乃用刘安《离骚传》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之语;“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”,则直抄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,一字不易。这说明,班固不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,是直承刘安、司马迁的(当然还有别的原因,详后)。《离骚序》(见《楚辞补注》)转述刘安《离骚传》“若《离骚》者,可谓兼之”之语,亦未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。

班固《汉书》之作,时间是在光武帝刘秀建武末年到章帝建初中(参《后汉书》本传)。其《离骚》二《序》,亦在章帝建初年间或稍后(别详拙著《汉楚辞学史》第六章)。但就在这一时期,开始有人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了。此事颇为重要,请详论如次:

王充《论衡·案书》评扬雄《反离骚》并不是“尽反”《离骚》有云:“扬子云反《离骚》之经,非能尽反,一篇文往往见非,反而夺之。”此言“一篇文”以下,学者们疑有脱讹,今不细论;但其云“扬子云反《离骚》之经”云云,说明王充写《案书》时《离骚》已被称为“经”了。又,考王充著《论衡》的时间,草创于明帝永平初年,定稿于章帝元和、章和之际,即《论衡·讲瑞》所云“为此论草于永平之初,至元和、章和之际,孝章耀德,天下和洽,……此篇已成,故不得载”,时间前后近三十年。又检《案书》一文中有“今尚书郎班固,兰台令杨终、傅毅之徒,虽无篇章,赋颂记奏,文辞斐炳,赋象屈原、贾生,奏象唐林、谷永”等语,而检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,记“永平五年,兄固诏诣校书郎”;直到章帝建初四年撰为《白虎通德论》,班固仍是郎官(参《后汉书·杨终列传》)。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》记傅毅“建初中”“为兰台令史”;而在建初四年前拜车骑将军马防军司马(参《章帝纪》、《马防列传》)。杨终在章帝时“征诣兰台,拜校书郎”(《后汉书·杨终列传》),起止的具体时间无考。综上所述,《论衡·案书》一篇撰成的时间,不得晚于章帝建初四年。也就是说,至迟在这一时期,已有人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了。

对这一问题尚需补充讨论两点:

其一,从《论衡·案书》记“《离骚》之经”的文法结构来看,其时尚未形成“《离骚经》”这一比较凝固的专称。

其二,《论衡·案书》言“《离骚》之经”,这是王充本人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,还是他借用当时开始

通行的提法,这一点不易确定。今检《论衡》,《变动》篇亦提及《离骚》,却没有称“经”,其文为:“《离骚楚辞》悽怆,……”又从《论衡》中的屈原评论的文句观之,王充很同情屈原的遭遇,很推崇屈原的忠节行为,故《书虚》云:“屈原怀恨,自投湘江”;《谴告》云:“屈原疾楚之臧谤,故称香洁之辞”;《累害》云:“屈平洁白,……”;等等。但是,王充论屈原,有一重要观点,即:屈原的遭讪被害乃是命中注定,故《偶会》称“屈原自沉”是“命当绝”;《命义》也说屈原“尽忠辅上,竭王臣之节,而楚放其身”,盖“命凶之人,虽勉操行,未必无祸”(引同上)。难怪他在《命禄》中说“凡人遇偶及遭累害,皆由命也”,并引贾谊《鹏鸟赋》以及扬雄评屈原的“遇不遇,命也”为说,可见他也认为屈原之不幸遭遇乃是命定。(以上别详拙著《汉楚辞学史》第六章)因此,要判定《案书》中“《离骚》之经”的提法是王充本人之说还是借用当时开始通行的提法,是不容易的。本文姑存其疑,以俟高明。

### 三

上面讨论了在东汉前期已经出现了“《离骚》之经”这一提法。再需指出,在东汉前期《离骚》称“经”,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现象,而是两汉文人推崇屈原及其代表作《离骚》的必然结果,也是东汉前期经学尊显,屈原评论逐步被纳入经学体系之中的必然结果。

两汉文人评屈论《骚》,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对立的意见。由贾谊发其端的用消极避世人生观批评屈原思想行为的意见,经过司马迁、扬雄、班固等人的推衍,逐步形成了一种倾向。另一方面,从刘安开始,推崇屈原和《离骚》的意见也一步步形成倾向性的评论,屈原及其代表作《离骚》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。而且,那些批评屈原思想行为的文人学者,在汉代儒家经学逐步定于一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,也由杂用儒、道变而为独操经学的思想武器;而那些推崇屈原思想行为的文人学者,也大致如此。这是汉代屈原及《离骚》评论中一种带规律性的文化现象。相灭相生,相反相成,其结果,逐步将屈原推上了圣贤的宝座,《离骚》也因此而被尊称为“经”了。这一历史进程完形于东汉前期,并由东汉后中期的王逸从经学的角度做了完备的总结。

西汉前期的贾谊评屈,表现出对屈原眷怀故国、守志不移思想行为的不理解和责难,故《吊屈原赋》有“风飘飘其高逝兮,夫固自缩而远去,袭九渊之神龙兮,沕深潜以自珍,……所贵圣人之神德兮,远浊世而自藏”诸语,用的是《庄子》文意(如《列御寇》、《则阳》等)。而刘安《离骚传》说屈原是因为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而作《离骚》,并推称《离骚》兼有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的“好色而不淫”和“怨诽而不乱”,这一评价已将《离骚》与《诗》相提并论了,对后来的评论家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但是,刘安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,说他“志洁”、“行廉”,“自疏濯淖污泥之中,蝉蜕于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,不获世之滋垢,皜然泥而不滓”云云,用的则是道家言(如《淮南子》中《精神》、《原道》、《俶真》、《修务》等可找到类似言论)。其后司马迁评屈论《骚》,主要是继承和发挥贾谊的观点(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“太史公曰”)。至于西汉后期的刘向,他作《九叹》,就象他在元帝时作《疾谗》八篇一样,“依兴古事”(《汉书》本传),通过闵伤屈原不幸遭遇来抒发自己宗室忧国的叹怀之意。他找到了自己身世与屈原的相通之处,故有“亲忠正之惓诚兮,招贞良与明智”(《九叹·愍命》)之类议论,涉及到了君臣之义。西汉末期的扬雄,《自序》(《汉书》本传)用“君子得时则大行,不得时则龙蛇,遇不遇命也,何必湛身哉”的观点批评屈原;但其评赋,强调辞赋的政治教化功能,曰“法度所存”,贤人君子之“正”(《自序》),《法言·吾子》则谓屈赋属于“诗人之赋丽以则”,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引其说《离骚》“体同诗雅”。他还批评景差、宋玉以下是“辞人之赋丽以淫”(《法言·吾子》)。所谓“淫”,即“书

恶淫辞之渥法度”(同上),所以屈赋的“则”,盖《吾子》所说的“事辞称则经”,实有裨“张其纲纪,谨其教化”(《法言·先知》)。总之,扬雄实质上已经用“经”的观念看待《离骚》了。

逮及光武中兴,社会政治观念出现了新的特征。清人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13有“两汉风俗”条,云:“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,师儒虽盛,而大义未明。故新莽居摄,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。光武有鉴于此,故尊崇节义,敦厉名实,所举用者,莫非经明行修之人,而风俗为之一变。”顾氏之言验之史籍,信而有征。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云:“昔王莽、更始之际,天下散乱,礼乐分崩,典文残落。及光武中兴,爱好经术,未及下车,而先访儒雅,採求阙文,补缀漏逸。……于是立《五经》博士,各以家法教授。”明帝时,隆太学,“亲行其礼”,“帝正坐自讲,诸儒执经问难于前,冠带缙绅之人,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。”(同上)章帝更是在“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”,帝“亲临称制,如石渠故事”(同上)。经学隆兴,盛极一时。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,《离骚》被尊称为“经”,已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故明帝永平时梁竦作《悼骚赋》,称“屈平濯德兮絜显芬香”,更云:“祖圣道而垂典兮,褒忠孝以为珍。既匡救而不得兮,必殒命而后仁。惟贾傅其违指兮,何杨生之欺真(聚珍本《东观汉记》作‘欺真’)?”前四句提倡仁人志士的忠孝仁义行为,认为屈原正是这样的楷模;后二句批评贾谊、扬雄的评屈观点是“违指”、“欺真”,说二人的言论不符合忠孝仁义之道。而“祖圣道而垂典”云云,只差没有直接称《离骚》为“经”了。由此观之,至迟在章帝初年出现“《离骚》之经”的提法,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当然也有人反对《离骚》称“经”,班固就是代表人物。其《离骚赞序》就只解“离骚”二字,而不及“经”义。《离骚序》批评刘安《离骚传》所谓《离骚》义兼《风》、《雅》的观点,言“斯论似过其真”,并云:“今若屈原,露才扬己,竞乎危国群小之间,以离谗贼。然责数怀王,怨恶椒、兰、愁神苦思,强其非人,忿怼不容,沉江而死,亦贬清絜狂狷景行之士。多称昆仑、帝阍、宓妃虚无之语,皆非法度之政、经义所载。”这里表现出的,是从最高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“君臣之正义”(《后汉书·贾逵列传》载逵奏章帝语)的角度批评屈原。而“皆非法度之政、经义所载”之语,说明他至少认为《离骚》是不配称“经”的,而非《离骚》是否已经称“经”。

正因为如此,作为两汉屈原及楚辞研究总结者的王逸要从忠信名节的“人臣之义”和官方经学的角度批驳班固,宣扬并捍卫《离骚》的“经”的地位。《楚辞章句·离骚经章句·序》专门训解了“离骚经”三字旨意(引见前),承认并肯定了东汉前期以来《离骚》称“经”的历史意义。《序》还言:“《离骚》之文,依《诗》取兴,引类譬喻。”《后叙》亦称:“人臣之义,以忠正为高,以伏节为贤。”他还从孔子终“则大义乖而微言绝”说起,称“屈原履忠被谮,忧悲愁思,独依诗人之义而作《离骚》”,这是说《离骚》直承孔学,屈原也就是直承孔圣的亚圣了。他还进一步指出:“夫《离骚》之文,依托《五经》以立义焉:‘帝高阳之苗裔’,则‘厥初生民,时惟姜嫄’也;‘纫秋兰以为佩’,则‘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’也;‘夕揽洲之宿莽’,则《易》‘潜龙勿用’也;‘驰玉虬而乘鹭’,则‘时乘六龙以御天’也;‘就重华而陈词’,则《尚书》咎繇之谋谟也;‘登昆仑而涉流沙’,则《禹贡》之敷土也。”这种将《离骚》文句与经书附会起来所做的求同性比较,固然是经师结习,但是,王逸却由此而将《离骚》为什么称“经”的原委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他的观点与班固对立,但他们都是以“经”为评价尺度和价值标准。他们争论的是《离骚》该不该称“经”,配不配称“经”,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:最迟在东汉前期,《离骚》已经称“经”,并开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其后的屈原评论和楚辞研究。对此,今天我们可能有不同看法,但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,应该另文专论。